



新时代经济思想的发展逻辑

■ 洪银兴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时代，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又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以人民为中心： 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

2012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观。

首先，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党的十八大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且绘就了两个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蓝图。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蓝图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第一个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个十五年全面现代化时是要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的发展进程。

其次，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注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要求全党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精神。相应的，新时代所要解决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包含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脱贫攻坚战。2013年党中央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底实现全面脱贫后，把共同富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就“十四五”规划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为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包含

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内容，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基于客观规律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提出，我国经济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作为经济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其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国际前沿核心技术。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为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

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成为发展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追求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协调成为发展手段意味着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协调能够促进国家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发展的整体水平。协调成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涉及产业、城乡、区域等在结构上的平衡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财富观的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遵循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利用自由贸易区等开放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实行开放式创新；参与全球化分工，将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重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 升，依托核心技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过去偏重制造业对外开放，转向涵盖各个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全方位开放；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入新时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让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我国在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把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据这一主要矛盾，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引领我国实现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基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第一，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由此提出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拉



开改革开放时代大幕的里程碑，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新的里程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

第一，确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三个方面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以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动员了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资源和活力。尤其是外资的进入，民资的迅猛发展。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促使国有制经济改革自身的体制、有进有

退，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从而增强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业内共同发展，为各类企业增强活力、做大做强做优提供资本动力和机制。

多种分配方式表现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其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提高了劳动效率；二是充分动员和激励属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使一切创造财富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的活力竞相迸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优势，不只是提高劳动效率，还是在要素报酬的分配结构中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收入，鼓励勤劳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配置资源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

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所特有的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和奖惩分明的激励功能，不仅能按效率目标决定资源流到哪里（部门、企业）去，还能决定各种要素（资源）的有效组合，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制度优势不只是克服两极分化、外部性和宏观失衡等方面的市场失灵，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跨地区建设项目可以在制度上举全国之力得以完成。二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建设市场，市场体系的标准会更高。三是在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政府作用非常明显。

第二，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

党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改革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产权制度目标是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即产权激励制度。

市场配置的要素必须是有一定产权归属的要素，既有增量又有存量。相比于增量要素，存量要素规模巨大。市场配置存量要素可以在优化资产质量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目

标。市场体系是要素市场配置的载体和平台。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是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中竞争政策起着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资源配置以竞争为导向。其次，市场主体的培育以竞争为基础。再次，产业组织政策以竞争为基础。最后，市场秩序建设以竞争秩序建设为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形成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其所要强化的竞争政策包含规范竞争秩序的要求，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经济业态的竞争秩序建设。

第三，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一是“总量+结构+防风险”的组合构成了宏观调控目标。2013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2014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2015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2016年扩充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2017年到2019年的宏观调控目标都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2018年以后我国经济既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又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央宏观调控突出六个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二是明确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伦敦金融城举行的中英工商峰会时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都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之内。”并且强调：“中国经济运行将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会硬着陆。”合理区间的上限即是防范通货膨胀。合理区间的下限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失业率的上限，第二个因素是人口新增条件下居民收入不下降。这样，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就有一个合理区间。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判断，将合理区间作为政府进行科学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和宏观调控政策运用的主要依据。合理区间是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区间，在这一区间内国家就不需要随意地调控，货币政策也可以是中性的。为了防止经济运行超出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时出现大起大落所导致的经济破坏，以及相应的强调节所带来的较大的调节成本，在接近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时国家需要及时进行微调，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区间调控方式。区间调控需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起来，分别作为经济运行的“上限”和“下限”，以防止单目标可能带来的风险。复合目标组成的区间目标代替单一目标，更易于稳定市场主体对政策的预期，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精准度。

三是明确定向调控方向。区间调控不意味着在合理区间内国家不做任何宏观调控，而是不搞“大水漫灌”式的调控，进行定向调控。定向调控以调结构为重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差别化地制定调控政策。通过对不同

部门、不同群体有针对性降税、降费、降准、降息，着力解决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型行业的经营困难，增强它们的活力，做到有保有压，有扶有控，这是宏观调控的精准化、定向化。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各有侧重，区间调控侧重于稳总量，定向调控注重调结构。两者紧密结合，形成稳增长调结构合力，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内涵和方式手段，是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对宏观调控理论的重大贡献。

四是创新宏观调控手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涉及融资体制改革、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税收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即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

培育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激发需求侧活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根据供给和需求相互依存的经济原理，经济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努力，因此改革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推进。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

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就调节方式来说，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节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第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虚拟经济只是经济的润滑剂，即使其有扩张资本的能力，也要反映在其所推动的实体经济的扩张上。在现实中存在“脱实向虚”的现象，除了虚拟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一夜暴富”的诱人投机现象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经营困难，因负担太重无利可图而投资不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还是要实体经济发力，保障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在实体经济领域培育发展的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二，解决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问题。其衡量标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说，经过改革，尤其是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企业的效率，单个要素的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都有明显提高。但各个要素集合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高。这同供给侧的要素配置结构相关。改革目标是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的基本途径。

第三，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问题。产品的质量、技术档次、卫生、安全等不适合需求表明我国有效供给的短缺。与此同时又存在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无效产能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属于长期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加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等方面的需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满足中高端消费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问题。供给侧的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解决。

第四，解决供给侧的动力不足问题。已有的市场化改革在需求侧产生了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压力。已有的改革解决了产权制度的动力问题，但供给侧仍动力不足。这与激励制度相关，突出表现是企业的高税负、高利息、高社会负担。还有不少企业因高杠杆，面临财务困难，陷入债务困境，其中有不少成为所谓的“僵尸企业”。企业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也就缺少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与需求侧突出的市场选择不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发展的动力。供给侧突出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轻装上阵。二是保护企业家财

产，激励企业家精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忽视需求侧动力的激发。党中央及时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任务。这时刺激需求，在需求端激发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要求，并且提出深化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配合的思路。

新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

首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继续推动全球化的进程，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必须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根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与沿线国家多层次经贸合作，带动我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

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体现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第二，进口与出口并重。第三，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深度。不仅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进入中国的领域，而且进一步放开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第四，建立对外开放的新载体。为推动资源和商品更为便利的国际流动，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最后，形成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进入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生战略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型开放经济。内需型开放的实质是创新导向，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

点。推动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需要以创新为导向发展开放型经济。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引领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体现增长的内生性，仍然需要发挥开放型经济的引擎作用。

我国的产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关键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有两个方向。一是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攀升的产业也要布局创新链。这就提出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其路径就是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干边学，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

国民经济外循环思想同时可应用到“走出去”中。尤其是进入“一带一路”项目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走出去的价值链既有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也包括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产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上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作者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文科资深教授，本文为作者《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述评》系列研究第四部分“强起来时代党的经济思想”）